

基于体认语言学再议弗雷格语义三角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王 寅

王天翼

[摘 要] 德国著名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弗雷格率先将数学和逻辑学有机结合,创立了数理逻辑,强调了学科的先验性和客观性,为其批判传统指称论建构语义三角奠定了基本思路。他继承了古希腊形而上哲学的衣钵,把“人本因素”排除在外,认为“顶点Sense(涵义)”具有客观镜像性。本文基于体认语言学(强调心智、语言和意义的唯物性和人本性等)反思了语义三角(内涵决定外延,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等),且批判了其先验论和客观主义之失误。据此“涵义”当修补为“客主兼治的认知”,将其下拉,取消底边的虚线,阻断语符与指称对象之间的任何联系,两者之间的关系一定具有“体认性”,这就有了体认语言学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据此可很好地解释一物多名现象。

[关键词] 弗雷格 语义三角 客观主义 体认语言学 一物多名

引 言

德国著名学者弗雷格(Frege, 1848-1925)率先将数学和逻辑学有机整合,创建了“现代数理逻辑”(又叫现代形式逻辑,王寅, 2023a)。他既是语言哲学的先驱,又是现代语义学之父,为二十世纪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此后的语义研究开辟了两个研究方向:外延论和内涵论。

弗雷格(2004)认为世界的规律只能依靠语言的规律来发现和描写,进而还提出了表达方法比思想内容本身更重要的观点,可用数理逻辑的方法来研究语言。这一观点具有划时代意义,使得西方哲学开始出现“语言签约转向”,学界常称之为“哥白尼革命”。他还认为,数学具有先验性、客观性和分析性,这就为他分析语言和论述意义定下了基调,详见下文对语义三角中Sense(涵义)的反思。而王寅(2020)所提出的体认语言学正是在反思西方认知语言学理论缺陷,融合辩证唯物论与人本观的基础上形成的本土化理论,其核心主张为重新解读弗雷格的语义三角提供了关键理论支撑,下文将对其理论内涵与建构理据予以阐释。

1 体认语言学与体认语义学

雷科夫与约翰逊(Lakoff & Johnson, 1980、1999)针对客观主义西方哲学提出了“体验哲学”,并在此

[收稿日期]2025-12-11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文科视野下的语言学跨学科探索:体认语言学的理论与实践”(批准号:25FY YB032)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信息]王寅,男,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体认语言学、语言哲学,电子邮箱:angloamerican@163.com;王天翼,男,汉族,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体认语言学、语言哲学,电子邮箱:wangsusu@163.com

基础上建构了认知语言学,突破了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束缚,将语言学研究带入到后现代哲学时期(王寅,2020、2021)。二十世纪语言学发展史表明,一个学派的流行周期一般约为50年,雷约的理论也已经过半个世纪的历程^[1],其缺陷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Dąbrowska, 2016; 王寅, 2007、2014、2023c; 李洪儒, 2022等)所认识。具体可总结为:

(1)体验哲学虽提出了与索绪尔(先验论)和乔姆斯基(天赋论)基于唯心主义哲学理论完全相反的观点,大力提倡“心智的体验性”,但在论述这一观点时未能从唯物主义立场加以批判,更只字未提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这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是一大缺憾。而且他们也未能在语言哲学和后现代哲学,对于中国传统的“身体哲学”(张再林,2018)更是有付阙如。

认知语言学所涉及的哲学理论超过以往任何一个语言学派,因为约翰逊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他的加盟使得语言学研究的哲学内容大大丰富。正如汉语中成语所言“成亦萧何,败亦萧何”(王寅, 2025),他们在认知语言学中涉及了大量的哲学理论,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哲学视野仍不开阔。这正好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空间。

(2)“认知语言学”的学科名称稍欠妥当。何为“认知”,只要经过心智加工的都可称之为“认知”,哪个语言理论不是人类心智研究的成果? 雷科夫与约翰逊(Lakoff & Johnson, 1980、1999)所论述的“认知”,有时外延过宽,有时又将其局限于“体验性认知”上,还信奉弗洛伊德的观点,将其视为“无意识性”,且认为占95%。值得商榷的是,科研工作者在创新时的意识都是无意识性的吗? 这95%的比例依据何在?

乔姆斯基也自称是“认知语言学家”,因为乔姆斯基(Chomsky, 1957、1968)率先从“心智”角度研究语言,雷科夫和约翰逊所倡导的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完全与乔氏背道而驰,如何能够与乔姆斯基学派的认知研究相区分(王寅,2014)。学界不得不区分“狭义的认识”与“广义的认识”,是否可以重新命名呢?

(3)雷科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 1999)所提出的体验哲学并未明确指出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理论的两大关键弊端:唯心论、非人本。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王寅(2014、2020)主张将国外的认知语言学本土化为“体认语言学”,用“体”强调唯物论,用“认”凸显“人本观”。这也完全符合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客主兼治”的基本观点,在“体认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中,“体”的主要体现是“客”,强调唯物论“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立场;“主”对应于“认(右边是‘人’)”,主要体现了马列主义所论述“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本精神。这样就可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可纠正机械唯物论的客观主义哲学观,也可弥补古希腊形而上学“非人本观”的缺陷,更能据此反思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

体验哲学共有三条基本原则(Lakoff & Johnson, 1999: 1):

- ① 心智的体验性(*The mind is inherently embodied.*);
- ② 思维的无意识性(*Thought is mostly unconscious.*);
- ③ 概念的隐喻性(*Abstract concepts are largely metaphorical.*)。

在此基础上,认知语言学也是从体验性角度论述了语言的成因,这就与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唯心论语言观分道扬镳。但遗憾的是,该理论的最大亮点未能在学科名称中体现出来,依旧将这一新兴的

语言理论冠名以“认知”，这与乔姆斯基和诸多认知科学家所论述的语言认知观在名称上没有区分开来。

笔者经过深入研究发现，雷科夫和约翰逊的“体验观(embodiment)”只能说是“具有唯物倾向”，尚未能提升到“唯物主义”的高度来认识心智和语言的最基本性质，更未述及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认知语言学虽提出了用十余种认识方式(感觉、知觉、意象、图式、概念、认知模型、概念整合、识解、突显、隐喻、转喻、关联等)来解释语言成因，但始终未能将其上升到哲学的“人本观”这一高度来认识语言的本质特征和研究语言的基本策略。在此笔者重点推荐潘文国(2006)和李洪儒(2022)的观点，认为“语言学是人学”，只有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研究语言，才能彻底摆脱索绪尔(先验论，关门打语言)和乔姆斯基(天赋论，关门打句法)这两位语言学大师所采取的“唯心论”“非人本”哲学观的束缚。

本土化的体认语言学(王寅, 2014、2020; 胡壮麟, 2022; 祝朝伟, 2023; 廖光蓉, 2019; 李勇忠, 2021; 李葆嘉, 2022; 孔令翠, 2023; 王卉、姚振军, 2025; 钟书能、陈诗琪, 2026等)显然在“唯物论”和“人本观”这两大哲学立场上对认知语言学有了重要发展，将“认知”修补为“体认”之后就能凸显人类的认识和语言都源自于“体(实践)”，强调了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和中国的身体哲学(张再林, 2018)。有了“体”和“认”就可将感性论和理性论有机结合起来，摆脱用二元论的方法(唯物论vs唯心论)研究西方哲学的思路，而且这也与我国古人所提出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观物取象”的观点完全相同(体：身、物；认：取)，人类首先在观察诸身诸物的基础上形成了认识(象)，然后再用语言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就是体认语言学“现实—认知—语言”的核心原则。

正如潘文国教授于2023年8月18-20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第四届全国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学科建设高层论坛暨潘文国学术思想研讨会”上所言，“体认”与“认知”虽一字之差，却是一次理论上的飞跃。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任何一个语言学派基于这两大哲学原则来建构语言理论，因此它们是区别于其他所有语言学理论的分水岭。

笔者认为，“体”和“认”这两者就相当于毛泽东同志所论述的“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前者更强调“身体经验”“五官感知”；后者更强调“认知加工”“心智运作”。它们绝不是两个孤立的范畴，而是紧密关联，互为交融的，“体”是基础，“认”是升华，两者一直处于互动的链条之上。升华后的“认”还可能反作用于“体”，更合理地指导社会实践，可在更高层次上理解“认”，获得更新的“认”，由此不断推进人类文明。

基于这一理念，自然就可将“认知语义学”修补为“体认语义学”(王寅, 2022; 王天翼, 2025)。本文据此来重新解读弗雷格的语义三角。

2 弗雷格语义三角新解

弗雷格(Frege, 1960)在反思流行2000多年之久指称论之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新观点：语符是通过Sense(涵义)指向Referent(指称对象)的。在“指称对象”与“语符”之间增加了一个中介“涵义”，便可弥补传统指称论(语符的意义就在于事物之中)之不足。奥格登和理查兹将这一思想总结成“语义三角(Semantic Triangle)”(Ogden & Richards, 1923: 11)。很多年来国内外语言学界对语义三角都有述及，但忽略了若干重要理论要点，本文现概述如下，并根据体认语言学作出修补。

2.1 内涵决定外延

弗雷格是一位逻辑学家，他传承了密尔(Mill, 1983)“内涵决定外延”的观点，认为语符是通过“涵义

(相当于内涵)”指向“指称对象(Referent)”的,但并未详细论述前者是如何决定后者的,仅作笼统阐释。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为“现实—认知—语言^[2]”,但这里的“认知”与弗雷格的“Sense(涵义)”差距甚大,详见下文。

本文认为内涵与外延之间具有辩证关系,弗雷格的涵义论用“内涵决定外延”虽可解决指称论之缺憾,但这个“内涵”来自哪里却没有说明。体认语言学认为内涵是在对若干同类事物进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样就可较好地认识这两者之间的辩证性。同时还详解了“认知”环节,主要包括:感觉、知觉、意象、概念化、范畴化、意义、隐转语、识解等,这一分析还为唯物论的“物质是精神的基础^[3]”提供了一个详解过程(王寅,2007:171)。

2.2 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

莱布尼茨、休谟和康德区分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前者指两个表达式在任何情况下都等值,可记作 $a=a$,可从语言内部解释分析命题,为索乔二氏的“关门研究语言”奠定了理论基础;后者指两个表达式在某种情况下等值,可记作 $a=b$,这类命题之真当诉诸于语言的外部经验和使用场景,这就为语义的情境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弗雷格(Frege, 1960)发现有两种不同的“同一性(Equality 或 Sameness)”,且以“启明星(the Morning Star)”和“长庚星(the Evening Star)”为例进行了论述^[4]:

- (1) $a=a$ (先验的绝对等式,分析命题)
- (2) $a=b$ (后天的经验知识,综合命题)

这两个式子的“认知值(Cognitive Value)”是不相同的, $a=a$ 在任何情况下都正确,而 $a=b$ 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其涵义不同,它们之间的等同有条件限制,因此比 $a=a$ 提供了更多信息。他在文中还以启明星说明如下:“启明星是启明星”为分析命题,在任何情况下都正确,而“启明星是长庚星”是综合命题,必须依靠仔细的观察才能发现这一现象,因此它就好比前者传递了更多的信息。这两个命题虽都有相同的指称对象,但其涵义不同。也就是说,人们如何表示同样一颗星,是用启明星,还是用长庚星,取决于该星当时的具体情况:若是早晨看到的那颗亮星就说前者;若是黄昏时见到的那颗亮星,就用后者。由此还引申出语言哲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表达方法比内容更重要,从而也说明了语言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基础性,用恰当的言说方式来谈论哲学中的“存在”具有关键性。

这还涉及到语义的语境论(或上下文原则),即语义必须考虑到具体的使用环境,依据具体的上下文来确定词语的意义。弗雷格认为,决不能孤立地寻问一个词的意义,而只有在一个命题的上下文中才能寻得词语的确切意义,因此他又被视为语境论的首倡者。

从上可见,不同的语符具有不同的认知值,不同的表达方式蕴含以不同路径去认识和论说指称对象,这样就在“语符、涵义、指称对象”这三者之间建立了一个三角关系。奥格登和理查兹(1923:11)在他们的专著《意义的意义》中率先用学界常说的“语义三角(Semantic Triangle)”来说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在专著中将其解读为:语符通过涵义指向指称对象,这也充分体现了逻辑学的基本原理:内涵决定外延。

体认语言学坚持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以及认识论中的“经验论(Empiricism)”,反对弗雷格的

“先验论”和“客观论”，强调人们的知识主要是基于生活经验和互动感知形成的，但也不否认人具有一定的先天能力；同时也认为人们也可凭借自己的理性能力产生知识，如科学家的创新发明等。

奎因(Quine, 1951)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就主张取消分析与综合之间的区分，因为语言中几乎不存在绝对的同义词和同义句， $a=a$ 便无从说起。本文既然否认先验性，也就主张取消他们所说的分析命题。根据唯物主义认识论，人类的知识主要来自于对现实的感知，即便是数学中的 $a=a$ ，也是从生活经验中概括出来的，不存在先验性的分析命题。

2.3 涵义的客观性

弗雷格(2002)严格区分了“心理”和“逻辑”、“主观”和“客观”，认为在哲学研究中当排除心理活动和主观认识，因为它们与数理逻辑和语言表达不相兼容，因此他所说的“涵义”必须具有客观镜像性，这样才能反映世界的真实面貌。这也完全符合他作为自然科学家的身份，必须奉行客观主义立场。因此他认为数学和逻辑具有先验性和客观性，两者的结合物“数理逻辑”也是如此，并据此批判心理学家的观点：心理表象和观念情感具有主观性和个体性。在这一点上，弗雷格、维特根斯坦、罗素、卡尔纳普等语言哲学家所持立场相同。

雷科夫和约翰逊指出，“弗雷格对心理学的过度狭隘的立场使得他相信，心理因素仅具有主观性和个人性，不能产生任何公众性和普遍性。弗雷格偏执的反心理倾向使得他拒斥身体和想象对意义有任何作用”(Lakoff & Johnson, 1999: 468)。据此弗雷格所创建的理想语哲学派认为“语言与世界同构”也就在情理之中。他用“真值对应论”来确定意义，主张用纯粹客观性形式化方法来重构对世界的认识，从而与心理主义分道扬镳。这一主张直接影响到罗素(以“指称论”来批判心理主义)和维特根斯坦(用“图像论”来抵制心理学)。

体认语言学遵循马克思(1844)提出的“人化的自然界(humanized nature)”的观点，既认为物质是精神的基础，也认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本文主张将其称为“客主兼治论(先用‘客’强调物质是精神的基础，坚守唯物论立场；后用‘主’凸显‘人化、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两者的互动是人类形成认识、语言的最基本条件)”：人类的认识和语言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笔者主张用客主兼治的“认识(cognition)”来替代客观性“涵义(sense)”。

2.4 取消底边的虚线

语义的指称论认为，语符与所指对象之间具有直接关系，前者的意义直接由后者决定。但指称论解释不了大量的神话、无实指的概念和虚词，受到了很多学者的诟病，弗雷格试图用语义三角来弥补这些缺陷，这对于语义研究确实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此语义研究就有了两个方向：

- ①外延论，用现实世界中的指称对象来解释语义；
- ②内涵论，用代表外物的抽象性涵义来解释语义。

百余年来的语义研究都在沿着这两大方向前行(王寅, 2014)，因此弗雷格被称为“现代语义学之父”当之无愧。

但语义三角的底边画了一条虚线，说明在弗雷格的思想中仍残留指称论的理论痕迹。本研究依据

体认语言学的观点,认为只有通过“惟人参之(刘勰语)”的体认加工,人们才能用语言符号来指称外界的对象,也只有通过人的体认才能将语言符号指向所指对象。如没有人,就没有语言,语义也就无从谈起。因此笔者主张取消语义三角的底边,即使是虚线,它也不具备存在的合理性,这就引出了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用人的“客主兼治的认知”彻底阻断“现实(即指称对象)”与“语言”之间的任何联系,以凸显语言的人本观(潘文国,2006;李洪儒,2021;王寅,2014)。

3 体认语言学的出场

3.1 体认语言学

雷科夫和约翰逊所创立的体验哲学及基于其上的认知语言学,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王寅,2003c),使得语言研究摆脱了索乔二氏基于唯心论和非人本观的羁绊,将其带入到后现代哲学时代。但笔者也发现了他们的不足,即虽在语言理论上涉及到很多哲学观点,但其哲学视野还不开阔,如论述“心智的体验性”时未能述及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在概括十数种认知方式时未能从哲学的人本观高度来理解语言,这就为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探索空间。笔者尝试将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其核心内容为“客主兼治论”),以及后现代哲学中的人本观融入到二十一世纪的语言理论建构之中,主张将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本土化为“体认哲学”和“体认语言学”,认为一切认识、心智、概念、意义,包括语言,都是来自于对客观外界的“互动体验(体)”和“认知加工(认)”,当前学界还有一个术语“具身认知”,其实它与“体认”的基本观点一致(吴菡,2025)。雷科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 1999)提出的“Embodied Philosophy”,笔者一直主张将其译为“体验”,这样可更好地进入哲学话语体系,因为哲学界早就有了“经验论(经验主义)、先验论(先验主义)、超验论(超验主义)”这类专题和术语,并有明确而又详细的论述,它们在西方哲学界争论了2000多年,构成了西方哲学的一项主体内容。现再增加一个“体验论、体验哲学”,正好可与哲学界常用术语相对应,可理解雷科夫和约翰逊所论述的“体验哲学”之要义。

“体验”和“具身”主要指身体经验、五官感知,其后再加上一个“认知”,更强调心智加工,因此就有了“体验认知”或“具身认知”,前者可简称“体认(Embodied Cognition)”。笔者于2002年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一文中率先在语言学界使用这个术语,《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于2005年正式收录这一词语。

我国当下所大力倡导的“文史哲打通的新文科”给语言工作者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语言研究和教学从大类上来说属于“文”,大部分人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以及学科发展史也较为熟悉,但对于国内和国外^[9],外语界和汉语界来说,普遍缺少的是“哲”,因此二十一世纪的语言工作者必须尽快加强哲学修养,若缺少这方面的知识,语言研究将难以深入进行,也不符合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与时俱进”的精神。中西语言哲学专委会前会长钱冠连教授早就指出:“早补哲学早得益。”他与外语界的其他教授于二十一世纪初就成立了这个学会,20多年来每年都举办“夏日语言哲学读书院”,对高校教师和研究生进行培训。正如2023年在云南师大举办第18届夏日书院时该校致辞的一位副校长所言,中西语言哲学专委会领先新文科20年。据此,笔者一直倡导“顺哲学之藤,摸语言学瓜”。体认语言学正符合新文科要求,将新文科的理念落到实处,沿着西方哲学发展简史,梳理了体认语言学如何应运而生的过程(王寅,2020)。这就是《周易》和《说文解字》中所说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也与荀

子所论述的“五官感知”和“心的征知”完全吻合。据此本研究拟对弗雷格的语义三角作如下修补(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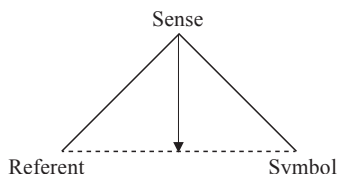


图1 语义三角图

将语义三角中的顶点“涵义”修补为“客主兼治的认知”，再下拉至底边隔绝“现实”与“语言”之间的任何联系，以能体现马克思(1844)“humanized nature(人化的自然界)”和周易、许慎、荀子、刘勰等的唯物主义人本观，这就有了体认语言学所论述的线性核心原则(见图2)。



图2 体认语言学的线性核心原则

3.2 一物多名的体认性解读

语言哲学家为解释一物多名的问题殚精竭虑，提出了诸多解决方案(王寅,2014:571-575)。本研究基于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现以“杜鹃花”为例说明如下(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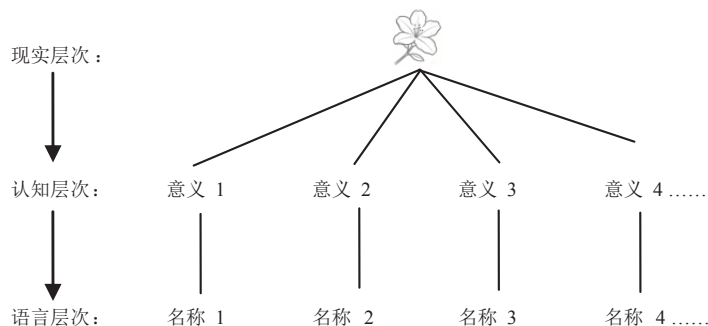


图3 依据体认语言学核心原则解读一物多名

图3左栏竖向列出了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对应“现实”的是含有很多属性的指称对象,人们认识到它们的某一属性后,然后就基于它起个名称,如同是一个“金星”,早上看到它时就称为“the Morning Star(启明星)”,黄昏时看到它时就叫“the Evening Star(长庚星)”。又例“杜鹃花”在汉语中有十数个不同的名称,现简析如下:

(1)杜鹃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与杜鹃鸟紧密相连。据说古代有一位名叫杜宇(即神农帝)的蜀国国王,他死后化为杜鹃鸟,每年春夏之时啼鸣不止,提醒农人收割小麦,直至哀鸣出血而死,其血滴在

山中的花上,使其成为红色的杜鹃花。

(2)唐杜鹃:杜鹃花在唐代文化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常为文人骚客赞美的对象,该名称的命名机制体现了鲜明的历史文化传统。

(3)映山红:当杜鹃花在山中盛开时,其鲜艳的红色与周围环境形成鲜明对比,给人以强烈的视觉体验。此名主要依据视觉感受。

(4)照山红:这个名称与上基本相同,强调了杜鹃花在阳光照射下显得格外鲜艳,反映了人们从光照效果来命名的体认理据。

(5)满山红: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盛开时,整个山头都呈现成红色,故有此名,体现了人们从整体景象来命名的体认方式。

(6)红鹃:这一名称则将上面述及的两种体认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既保留了“鸟”的意象,也凸显了其颜色属性。

(7)清明花:杜鹃花开时正逢清明时节,故有此名,这体现了人们根据花的开放季节来命名的理据。

(8)山踯躅(zhí zhú):描写了人们看到杜鹃花后在山上徘徊不前,流连忘返的样子。美丽的杜鹃花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而踯躅不前,反映了赏花人的行为。

(9)羊踯躅:与上一名称类似,是指羊群在杜鹃花丛中觅食时久久徘徊而不愿离开状态。

(10)红踯躅:显而易见,该名称既凸显了杜鹃花的红色属性,也反映出人和动物的行为特征。

(11)山石榴:有些杜鹃花开后会结果,其形状有些类似于石榴,这是人们通过对开花后果实的认识而起的名称。

(12)谢豹花:这一名称来源于一个传说,从前有两个结拜的单身兄弟:杜鹃和谢豹,他们情同手足,靠挑盐到山里卖糊口,生活很清贫。有一天谢豹挑盐时担子滑下来压死一个小孩,被官府判了死刑。谢豹对去探监的杜鹃说,我现在蓬头垢面,想出去剃个头,你代我坐一下牢好吗?经杜鹃一阵疏通后自己进了监牢,谢豹出了牢门,但一去不回。几天后杜鹃顶替谢豹被斩首,死后变成一只冤鸟到处啼叫寻找谢豹,想问他为何要恩将仇报。后杜鹃因啼叫出血,洒遍山间,山上开出鲜红的花就叫杜鹃花。后谢豹因食言而病,流尽脓血而死,在流脓血的地方也长出了一种类似于杜鹃花的花,便称其为“谢豹花”。

同样一个杜鹃花在汉语中为何会有这么多的名称,正可用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作出合理解

释:人们通过互动感知认识了杜鹃花的某一属性,如颜色、形态、环境、人和动物的行为、文化意义等,然后择其一而命名。又例:日语中表示“厕所”的词语先后用过十多个(于进江,1995,田兴齐,1983),它们都抓住了“厕所”的某一特征,运用“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方式进行命名,其后隐含了不同的认知意义:

(1)从位置来命名:「川屋」(かわや)指建在河边可用水来冲洗;「東司」(とうし)指厕所位于建筑东侧;「後架」(こうか)指位于屋后或与“架”相关。

(2)从功能来命名:「手水場」(ちようずば)、「手洗い」(てあらい)、「お手洗い」,以“便后洗手”的清洁功能来指代如厕的整体过程;「便所」(べんじょ)指“方便”之处,强调其排泄功能;「化粧室」凸显了化妆这一动作,以其指代整体。

(3)从设施来命名:WC源自英语的“Water Closet”,指如厕后用到的冲水设施;「トイレ」指现代化卫生设施这一整体概念。

(4)从感受来命名:「憚り」(はばかり)凸显了社会观念中的“忌讳”或“隐私”(「憚り」意为顾忌)之义;「御不浄」(ごふじょう)指“不净”或“污秽”,以其来指代厕所。

可见,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不仅有力地批判了语义指称论,也为语言哲学界争论了多年的“一物多名”现象提供了一个合理而又可靠的体认解读,它也揭示了西方传统哲学所遵循2000多年的“客观主义”之关键缺陷。若依据客观论者的观点,人们看出的对象都应是相同的,起的名称也应是相同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与后现代哲学所论述的“多元论”一脉相承,完全符合后现代哲学的开山鼻祖尼采(Nietzsche, 1980)在1886年遗稿文献中所说的观点“*There is no fact, but all interpretation.*(无事实可言,所有一切都是解释。)",伽达默尔(2004)据此提出了“解释学(Hermeneutics)”,一切符号的意义都是人解释出来的。这也应了德里达(Derrida, 1976)的那句名言“*One hundred readers will produce one hundred Hamlets.*(一百个人念哈姆雷特,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王天翼(2017)根据体认语言学的基本理论,通过分析苏轼的《石钟山记》得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命名转喻观”(通过部分特征来指代整体),任何所指对象的命名,都遵循“择其一而舍其他”的方法,抓住事物的某一个属性来起个名称。没有必要将所有的属性都集中起来为所指对象命名,人们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必要,常循之道只能是:用“部分指代整体”的转喻性体认方式来称呼事物。这再次证明,语符根本不具有任意性,像似性才是它的根本属性(王寅,2023b)。

由此可见,弗雷格语义三角底边虚线的非合理性,事物与语符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直接或间接联系,其间必定经过“人之体认”这一关键环节。

4 结 语

弗雷格为语言哲学,特别是现代语义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笔者也认为他基于唯心论和客观主义建立的现代数理逻辑和语义三角也有理论缺憾。本文基于体认语言学的基本思路重新解读了语义三

角的基本观点,也深刻反思其失误之处。

体认语言学认为,人类的思想、心智、意义、语言、知识等只能是“体(感知体验)”和“认(认知加工)”的产物,弗雷格的现代数理逻辑和语义三角也正是在这两点上出现了理论上的局限,当用唯物论来批判他的先验论,用人本观来批判他的客观主义。语言和意义必定是客观性和主观性兼而有之,不能用客观主义的语义三角来解释。笔者主张将三角顶点的 Sense(涵义)修补成“客主兼治的认知”,且将其下拉到底边,阻断语符与指称对象之间的联系,取消虚线的底边,据此便有了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这就是笔者一直将体认语言学视为语言哲学之延续的原因。

语言哲学家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存在于语言之中,因此若承认语言具有体认性,知识必定具有体认性。进而言之,人的一生就是体认的一生,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体认文明史。

注释

- [1] 学界一般认为认知语言学发端于1975年,那年夏天雷科夫(Lakoff)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伯克莱分校举办了“认知科学研讨会”,四位著名学者:凯伊(Kay,颜色范畴的研究),罗茜(Rosch,原型范畴理论),泰尔米(Talmy,空间关系研究),菲尔墨(Fillmore,框架理论)做了主旨发言,使得雷科夫决定重起炉灶,建构认知语义学。他与汤普森(Lakoff & Thompson, 1975)合作发表了“认知语法入门(Introducing Cognitive Grammar)”的论文,此后与蓝纳格(Langacker),福考尼艾尔(Fauconnier)、泰尔米等人逐步建立了“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屈指算来,认知语言学已经历了整整50年了,本文算是对该学科的一个纪念。
- [2] 这与范戴克(van Dijk, 2008, 张兆旭、施智淼, 2025)提出的“话语—认知—社会”完全吻合,只是顺序颠倒了一下。
- [3] 我们主张将唯物论的传统说法“物质决定精神”修改成“物质是精神的基础”。若是“决定”,应是有某种物质就有对应的概念,没有前者也就没有后者。这一表述显然过头了:难道原来有而现在没有了某种物质,与它对应的概念就消亡了吗?如我国现已解决了“贫困户”问题,难道这个概念就不存在了吗?用“基础论”来取代“决定论”更合理。
- [4] 据说毕达哥拉斯早就有此发现,参见恩格斯(1925, 汉译1971:167)。
- [5] 因此,我国提出的“文史哲打通的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不仅推动了国内的文科研究(特别是语言学界),也为世界范围内的文科研究(包括语言学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 于进江. 日汉语同义词比较研究[J]. 日语学习与研究, 1995(3).
- 马克思. 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 王天翼. 外内兼治的体认语义学[J]. 外国语文研究, 2025(1).
- 王天翼. 命名转喻观——以石钟山命名为例[J]. 外语教学, 2017(4).
- 王寅. 体认翻译学(上下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 王寅. Talmy 认知语义学的理论、实践和发展——体认语义学刍议[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2(5).
- 王寅. 认知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王寅.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J]. 外国语文, 2014(6).
- 王寅. 体认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0.
- 王寅. “成亦萧何, 败亦萧何”的雷科夫和约翰逊——建构本土化的体认哲学和体认语言学[J]. 外语研究, 2025(2).
- 王寅. 现代形式逻辑入门[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23a.
- 王寅. 《王寅文集(第一卷)》:论语言符号像似性——对索绪尔任意说的挑战与补充[M]. 合肥:黄山书社, 2023b.
- 王寅. 体认语言学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3c(2).
- 田兴齐. 日语同义词及其教学[J]. 福建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3).
- 李洪儒. 语言的本质与世界形象、人的形象——体认语言学的哲学基础系列研究之一[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1(2).
- 李洪儒. 从哲学史角度看体认语言学的科学性和前沿性——体认语言学的哲学基础研究之二[J]. 当代外语研究, 2022(5).
- 吴茜. 具身认知与文化图式:中意习语语义的比较研究——兼论“差序格局”与“团契家族”的语言映射[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25(5).

- 张再林. 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8.
- 张兆旭、施智淼. 重申面子理论的普适性“意图与语境”——以日语中的顾及表达为例[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25(4).
- 潘文国. 语言学是入学[J]. 白城师范学院学报, 2006(1).
- 弗雷格(Frege, G.). 概念文字——一种模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C]//王路, 译. 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弗雷格(Frege, G.). 算术基础[M]. 王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加达默尔(Gadamer, H. G.). 真理与方法[M]. 洪汉鼎,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 Derrida, J. De la Grammatologie[C]// Spivak, G. C.tr. Of grammatology[M].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 Frege, Gottlob. On Sense and Nominatum[C]// In Greach, P. & Black, M(eds.).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ottlob Frege[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0.
- Lakoff, G. & H.Thompson. Introducing Cognitive Grammar[C].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975.
-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Lakoff, G. & M.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Nietzsche, F.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M]. 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 Herausgegeben, Berlin: de Gruyter, 1980.
- Ogden, C. K. & Richard, I. A. The Meaning of Meaning[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23.
- Quine, W. V. O.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51(60).
- van Dijk.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Rethought on Fregean Semantic Triangle: Based on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WANG Yin & WANG Tianyi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famous German mathematician and logician, Frege, was the first to organically combine these two disciplines, establishing mathematical logic, emphasizing its priori nature and objectivity, which decided his basic approach for criticizing traditional reference theory by constructing the semantic triangle. He inherited the mantle of ancient Greek metaphysics, excluded "human factors" and considered "the Vertex Sense" with an objective mirroring property.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which emphasizes materialism and human nature of mind, language and meaning), reflects the essence of the semantic triangle (intension determines extension, analytic propositions vs synthetic propositions, etc.), and criticizes the fallacy of priori theory and objectivism. Accordingly, "the Vertex Sense" should be supplemented as "objectivity-plus-subjectivity cognition", and pulled down to the base in order to cancel the dotted line, thus severing any connection between linguistic signs and referen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must be of embodied cognitivity, which gives rise to the kernel principle of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Reality—Cognition—Language, based on which polyonymy can be well explained.

Keywords: Frege; Semantic Triangle; Objectivism;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kernel principle; polyonymy

(责任编辑:李广悦)